

史鏡

《荀子》一书在《臣道》篇中，将一国之官员，分为态、篡、功、圣四类。顾名思义，态、篡二字，明显带有贬义，代指那些媚上欺下、贪墨枉法之佞臣污吏。即使就好的官员而言，荀子根据德性、才干、态度、政绩等诸多标准，也进行了细致界定。在他看来，真正优秀的官员，须具备且都具备的素质，应该包括如下方面：“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通俗来讲，名臣良吏贯彻与落实朝廷政令教化，其践行效果从来都是第一时间、不打折扣，执行力之强，如影随形一般；应对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时局变动，他们向来反应迅速，措施得当，平息事端，扭转危机，其解决速度仿佛应声回响一样；辨析与考量各种变幻无常、纷繁迭起的新情况，他们依循类似案例进行推论，综合比照相关制度进行研判，从而守正出新，对症下药，为之后决策树立准则典范。简言之，这实际强调，一名好的官员，必定要具备过硬的执行力、应变力、担当精神与引领能力。

临危纾难真能吏

倘若暂且抛开荀子观点的时代局限，该论断确实揭示出考察官吏优秀与否的关键性指标。翻检史籍，重温故事，尤其是“应卒遇变，齐给如响”这一条，极其可贵。唐玄宗后期，朝局已是危机四伏。当时著名书法家、政治家颜真卿因得罪奸相杨国忠，被排挤出京，出任平原太守。仕宦生涯受挫，颜真卿并未抱怨消沉，依然忧心时局。平原属于安禄山辖区，颜氏发现安禄山谋反迹象已十分明显。于是他未雨绸缪，假托本地阴雨连绵需要修整，暗中加固城墙，疏浚河道，广积粮食，招募士卒，做好抵御叛军准备。与此同时，为了麻痹

秦變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既是兵家之要，也是兴国之道。秦有天下，百折千回，殊为不易，以正合、以奇胜，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要借势有所作为。秦在稳步地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精心实施暗战之谋，演绎出大国争霸的精彩故事。

釜底抽薪

秦自武王再次进入东进模式后，秦楚关系处在微妙的转折期。武王高歌猛进，但不善言辞，在口舌之辩上感到力不从心。左丞相甘茂外为宿将，内为智囊，武王对其倾诉“楚客来使者多健，与寡人争辞，寡人数穷焉，为之奈何”。楚国经过宣、威两代有为君主的努力，在楚怀王前期，国力达到了鼎盛。“惟楚有才”绝非虚言，楚国人才济济，秦国既羡慕，也忌惮。

甘茂深思熟虑后提出建议，秦楚交往要讲究谋略。如果楚国使者能言善辩或精明强干，那么就设法不让他们达成目标、无法完成楚王交办的事情；如果楚国使者夸夸其谈或庸庸碌碌，那么就好好倾听他的需求，尽量帮他完成任务、风光回国。长此以往，楚国英才会逐渐被边缘化，楚国庸才反倒会得到重用。秦和楚国正常交往，会成为不声不响的“暗战”，逐步增加秦国优势。

甘茂之计可谓独到老辣。楚怀王本非庸主，但终陷于谗佞之中，令国内伤不断，形成恶性循环。最终，楚怀王甚至接受子兰的建议入秦，结果受秦所制、客死他乡，子兰却成为楚国令尹。秦楚较量只是秦谋天下的序曲，虎狼之师横行天下的背后是暗战无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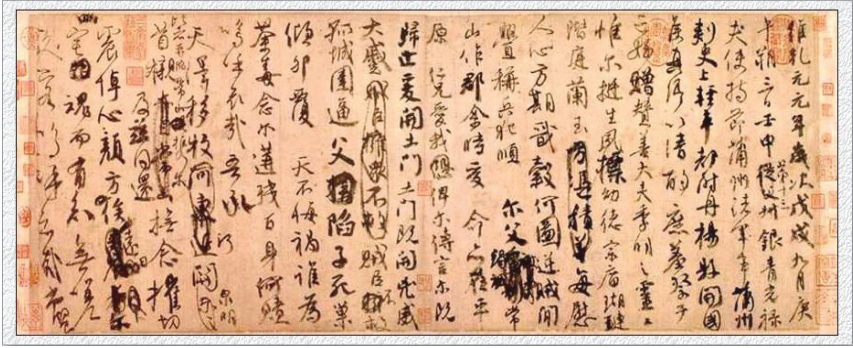
广布网络

秦至昭襄王时代，经过长期经营，暗战系统已经遍布六国。天下大

化育风气 造就良才

——中国古代吏治的镜鉴（四）

□ 王学斌



臣。然而颜真卿并不退缩，坦然上任。来到汝州，颜真卿立即被叛军囚禁，遭受百般恐吓羞辱。他毫不畏惧，有一次以其兄长颜杲卿的壮烈事迹为例，对叛军将领厉声道：“君等闻颜杲卿无？是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生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胁耶！”怒斥得对方哑口无言。后颜真卿被李希烈谋杀，《旧唐书》赞曰“自古皆死，得正为顺”，可见其勇于担当、舍身为国的风范深受后世称道，将永留汗青。

以身垂范育风气

北宋学者刘敞曾用“极忠不避难，临难不违义”来概括颜真卿胸怀社稷的精神，该评价实与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异曲同工之妙。众所周知，“先忧后乐”的思想出自范仲淹之手，他堪称那个时代名臣之代表。范之一生，始终忧庙堂之忧，急百姓之急，未尝倦怠。步入政坛初期，范仲淹就以敢于建言闻名。宋仁宗时期，有一年江、

淮、京东等区域发生非常严重的蝗灾与旱灾。范恩请朝廷派遣官员前往灾区察看灾情，却迟迟没有得到答复。范仲淹于是向仁宗直谏：“官廷里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情形会怎么样呢？”仁宗显得十分难过。于是委任主动请缨的范仲淹去赈济灾情。范所到之处开仓放粮，奏请朝廷免除赋税，救济了众多百姓。后来李元昊起兵东进，延州周边诸多要塞失守，范仲淹又一次请求赴前线领兵御敌。他在边塞整伤军队，加强演练，巩固城防，兴修水利，广纳降军，用人不疑，终使西夏与北宋议和，保得一方平安。当时仁宗皇帝有意进取，要求大臣上陈改革主张。范仲淹深感“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向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后又陈奏“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揭开了“庆历新政”的大幕。虽然改革仅维持一年多便戛然而止，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由上可知，范仲淹为官谋事在先，处事周全，勇于任事，临事不乱，可谓执行力、应变力与担当精神兼具。

不过，更值得后世惜意的是，在《宋史·范仲淹传》中，编纂者专门写下一句深有见识的论断：北宋官员“每感激励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以身垂范，化育风气，引领官员蒿目时艰，经邦济世，这或许是范仲淹最为可贵之处。与范同期或稍晚，众多大臣受其熏染，为时政殚精竭虑。如韩琦最初任职四川，整治贪官，淘汰冗员，“活饥民百九十万”。当他由蜀地返回京师时，正值朝廷对西夏用兵，韩琦毛遂自荐，表示熟悉西北军务，与范仲淹联手“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欧阳修誉之为“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再如富弼勇于承担重任。一次辽国派使臣索要国土，形势颇为微妙。朝廷数次任命聘答官员，他们都强调情况叵测不敢前行。吕夷简推荐富弼出使。听闻此讯，欧阳修赶紧借颜真卿劝降李希烈之悲剧来劝告富弼留在京师。富弼不为所动，觐见皇帝时说：“人主忧虑臣下耻辱，臣下不敢爱惜生命贪生怕死。”后与辽国谈判时有礼有节，不辱使命，无怪乎史书称其“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

苏轼认为北宋“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作为后辈，苏轼之评价或不免略有溢美，却点出了范仲淹诸人的楷模作用。正是他们敢作敢当、以天下为己任之功与格局，塑造了优秀官员的样板，形成“头雁效应”，彼时诸如文彦博、苏轼、司马光、范纯仁等一大批士大夫联翩而起，共同化育了良好的政治风

气，从而保证久处积贫积弱局面的北宋不致遭受太大的动荡。

败局先由败吏生

反观历史上那些混乱不已的危局和变局时代，官员们往往徒事空谈、坐等局势糜烂。明末东林党领袖忧国事，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确实令人敬佩。然而更多的官员虽依附该旗号下，却终日忙于口舌之争，梁启超先生形容，“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清军“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最终上演了一幕幕“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黑色幽默。晚清政坛同样不堪。据曾国藩的观察，“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偷修袂而养狗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一旦有慷慨不平之人提出质疑，官员们“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贱而好自见”。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待到列强东来，形势遂一触即溃，终无可收拾。所以，政坛风气一旦变坏，还想培育大量优秀官员，真的是难上加难，几成奢望。

自我进取保风气

就改善政风，曾国藩有过独到之论，认为“一省风气全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气为转移”，也就意味着“关键少数”要真正发挥关键作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依古衡今，我们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担当领导责任和示范责任，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敢闯敢干、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用自身工作实绩展现好干部所应具备的执行力、应变力、担当精神，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政治风气，引领更多的党员同志见贤思齐，由人塑风，成风化人，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限制挥霍信托

信托的价值（二）

□王 涛 车 耳

19世纪时，在美国有一位名叫萨拉·伊顿的女士，她有四个儿女。她在生前所立遗嘱里，为儿女设立了一个信托，规定该信托资产的收益将支付给儿女，而信托本金部分则将保留给她的孙子孙女们，也就是家族的第三代人。在规定信托资产收益的分配时，萨拉和其受托人律师设定了一个限制，即受益人无权转让他的受益权，并且受益人的债权人无权对信托财产进行追索。这是一种双重限制，使得受益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外流，从而增强了对受益人的保护。

在萨拉女士去世后，她的一个儿子因为业务经营不善，申请了破产。而其债权人尼克尔斯得知这个儿子在可偿还债务之外还拥有一份信托财产的收益权时，便要求信托受托人将信托资产收益的一部分分给这个儿子，以便其用来偿还债务。萨拉指定的受托人认为，萨拉女士的儿子不能够用信托收益偿还自己的债务。尼克尔斯与这位受托人无法达成一致，他无法获得自己认为应得的偿还，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

1875年，美国最高法院就这起债务纠纷案件作出了终审判决。法官米勒认为，萨拉女士作为母亲，对自己的子女提供保障的行为是应该得到保护的，法律应该支持这种行为，因此信托文件中限制信托受益人转让受益权的约定是有效的。债权人尼克尔斯无权追索信托内的资产，无论萨拉女士的儿子欠了他多少钱。

这一案件的判决，确认了限制挥霍信托的有效性，也就是像萨拉这样通过限制儿子的挥霍从而限制潜在的债权人，达到保护受益人的目的。而在之后的实践中，这种信托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以对抗债权人的追索为目的。这个判决招致了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财产法著名学者格雷等人的强烈批评：“推行限制挥霍信托将导致特权阶级的诞生，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参与各种类型的投机甚至欺诈，并且，只要不触犯刑事犯罪，他们的财富总是在滚动增长着。”尽管争议不断，限制挥霍信托仍然迅速在美国各个州获得了认可。

在限制挥霍信托中，信托资产不可被受益人主动转让，也不可被受益人的债权人取得。在这个法律前提下，如果受益人发生债务纠纷，债权人认为受益人是该信托的受益人，因此要求追讨其名下的资产时，法院会

暗战之谋

□ 崔 庆

失去了魏王的信任和效力疆场的机会。凡此种种，秦军如虎添翼，所向披靡。

金亡六国

公元前237年，秦王嬴政继位已经十年，族灭嫪毐，放逐吕不韦，一代雄主傲立咸阳宫，少年帝国已经呼之欲出。但是，一件烦心事让嬴政耿耿于怀。一位名叫郑国的韩国水利专家“忽悠”秦国的事迹败露，举国震惊。

玩鹰反被鹰啄眼，秦国被看似孱弱的韩国耍了一把，本土派的宗室大臣力谏秦王驱逐六国客卿。客卿李斯入秦多年，上《谏逐客书》，慷慨陈词，让秦王幡然醒悟，收回成命。客卿不仅仅是秦治国理政的有力助手，还是秦国情报信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客卿不绝，秦之暗战就随时都能再次爆发出惊人威力。

秦灭六国，依然对于天下之才敞开怀抱，六国信息随着人流物流，源源不断汇集到咸阳，秦对天下局势全面掌握、精准研判，有助于制定切合实际的对外方略。就在李斯上书的这一年，公元前237年，尉缭入秦，为秦之暗战注入新的活力。

尉缭是战国著名的军事家，精于谋略，他向秦王阐述暗战的重要性，语出惊人：“愿大王勿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得巴蜀之后，独享厚利，为秦国宏略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秦志在天下，万金之费，在所不惜。尉缭一席话，让秦王心潮澎湃。秦王得遇知音，再也不愿放走尉缭，对其委以重任，命他担任国尉，主持对六国开展全面暗战。三十万金是个天文数字，秦王能够慷慨允诺，尉缭必定提出了详尽的预算执行方案，也就是各个击破的一揽子周密计划。此后，秦军以攻伐和暗战并重，犹如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



推动并拥有天下的整体战略。

秦国内，李斯与尉缭“英雄所见略同”，甚至更加激进。当年，李斯入秦，就曾建议要对六国重臣暗中开展“银弹”攻势。“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李斯和尉缭不谋而合，成为秦王的左膀右臂。

尉缭设计，李斯用事，姚贾之流奔走六国，秦国的暗战如火如荼。当赵国连遭大旱，又发地震，秦展开了最后攻势。秦深知李牧为一时良将、赵之支柱，便施反间计，使赵国冤杀李牧、自毁栋梁在先，秦军如入无人之境在后，轻松攻灭赵国。暗战之谋软硬兼施、变化多端，齐国在浑浑噩噩中被“温水煮青蛙”。秦不惜重金买通齐相后胜，导致齐国多年“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堂堂强齐成为缩头乌龟，既不助赵，也不帮楚，“送走”了一位又一位小伙伴，最后自己也孤立无援。

孙子曰：“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秦之兴起，诚然如是。暗战奇谋，间在六国，奇正相合，故成大功。